

閩北党史回憶集

第 二 期

內 部 刊 物
不 得 外 傳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說 明

這一專輯，全系我們外出訪問江西省及京、津、滬、寧等市原在閩北地區堅持過革命鬥爭的負責老同志的口述記錄稿和答復信件的一部分。記錄稿因行程匆匆均未及時整理呈老同志審閱，請鑒諒！如有錯誤和遺漏之處，概由記錄者負責，並希加以修改。由於這些材料全面系統地而有重點的反映出閩北地區黨的鬥爭歷史情況，並對閩北地區黨史編纂工作指出了正確方向。故集編成冊，供老同志互相參閱和地、縣黨史工作同志學習之需，不作外傳。

中共南平地委黨史辦公室

59·3·16

目 录

邵式平同志口述记录稿.....	(1)
薛子正同志口述记录稿 (并附信一封)	(3)
汪金祥同志来信.....	(15)
方志纯同志口述记录稿.....	(18)
饒守坤同志口述记录稿.....	(21)
刘文学同志来信.....	(30)
馬长炎同志口述记录稿.....	(31)
黄知真同志口述记录稿.....	(39)
附：閩北三年.....	(50)
陈仁洪同志口述记录稿.....	(61)
聶显书同志口述记录稿.....	(65)
吳越同志口述记录稿.....	(72)
徐罗福同志口述记录稿 (并附信一件)	(78)
毛彪同志口述记录稿.....	(85)
張昌龙同志口述记录稿.....	(90)
黄英同志来信 (附回忆录一份)	(94)
宣金堂同志口述记录稿.....	(100)

邵式平同志口述記錄稿

三次反圍剿之后，打敗了蔣介石，粉碎了圍剿。

在閩贛之間建立建黎泰根據地（建寧、黎川、泰寧），中心縣是在建寧，中心縣委書記余澤洪，當時城防司令劉××，開始這是一塊根據地。

另一塊根據地叫閩北蘇維埃區，是以崇安為中心，包括浦城、建甌、建陽、光澤、上饒、廣豐、鉛山。負責人開始是陳耿，後來是黃道、黃立貴（獨立師師長）、鄒琦、蕭韶、楊良生、祝維恆。

再一塊根據地是以資溪為中心，包括光澤、邵武、資溪、金溪、貴南、由我、彭祐、方志純創立的，共計三塊根據地。

閩北蘇區很老、人多、歷史長，在二次反圍剿前就有了，二次反圍剿建寧打了一下，勝利了。三次反圍剿，開始我們退出了建寧。三次反圍剿后，又建立建黎泰、邵武和資溪、金溪。1933年4月份四次反圍剿，建黎泰，崇安，金溪、資溪、貴南、邵武、光澤這三塊根據地打通，聯成一片，成立閩贛省，省主席由我擔任，省委書記顧作霖，組織部長黃道，軍區司令肖勁光，這個時候南城、廣昌等地都屬閩贛省管。

1932年至1934年間到過建寧的有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軍團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三軍團彭德懷、滕代遠，五軍團董振堂、劉伯堅，朱××，七軍團尋淮舟、蕭勁光、參謀長粟裕，九軍團羅炳輝、何長工、蔡樹藩，少共國際師政治委員馮文彬、蕭華。還有中央很多同志到過建寧。

1933年7、8月間，組織了東方軍，由彭德懷為司令，到

將東打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在沙溪口打福建土匪頭盧興邦，打了一仗後，蔣光鼐、蔡廷鍇，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蔣、蔡和我們聯盟反對蔣介石。這時，蔣介石從資溪、金溪，福州兩路進軍，十九路軍打敗了，孤立了我們，接着蔣介石又進行五次圍剿，把閩北又劃開三塊，來往交通很不方便，資溪、金溪變為游擊區，閩贛省只是剩下建黎泰了。

1933年10月黎川失守，閩贛府退到建寧。1934年廣昌、泰寧失守，這時，一、三、五、七軍團都退到建寧，蔣介石以“步步為營”的戰略進攻蘇區，七軍團大部都住在建寧。當時，建寧、泰寧之間又打了一仗，這仗未打好，我們失了泰寧，在一、三、五、七軍團退到建寧時，我在搞後勤工作，主要是搞糧食。五次反圍剿在建寧打得很久，1934年3月建寧城防由少共國際師蕭華、馮文彬負責，那時敵人從泰寧和黎川兩路進攻建寧，所以在1934年4、5月間退出建寧，到寧化、澎湃去。當時生活很苦，一天只吃一餐飯，朱總司令到建寧時很苦，什麼都沒有，我只剩一條小鴨子殺了請他。

退到寧化，那時縣委書記龍騰雲，是個好同志，中央來個電報，我一個人騎頭馬，到了中央，才知道中央在瑞金站不住腳，要長征北上了。

後階段方書記了介，他是被留下打游擊，掩護主力北上。

薛子正同志口述記錄稿(并附信一件)

我是1931年六、七月間到崇安的。

1930年我就到了贛東北紅軍第十軍，方志敏同志是政治委員，以后邵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的政治委員。

那时，黃道同志是閩北特委書記，他对情况比較知道，他是贛東北根据地創造人之一，不幸于1938年犧牲。

由此說明我在閩北經歷很淺，33年中央苏区打通，我被調到閩贛苏区（建宁、太宁、黎川，原是特区），先有軍区，后有党政，軍区司令員肖勁光，后成立七軍团，肖当政治委員兼司令員，后是叶劍英元帥兼司令員，邵式平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省委書記顧作霖，在內战时代已病死。

我們去到閩北时，閩北苏区已經垮台，30年因立三路綫把閩北独立团調去贛東北，中央要贛東北占領长江沿岸几个城市，切断长江，占領浮梁、乐平，那段情况即楊良生同志所写的情况。

30年下半年，贛東北軍隊回到贛東北，那时卢兴邦、刘和鼎和周志羣进攻閩北。刘和鼎从建阳光澤压过来，把崇安搞垮，我最初还在紅十軍工作，以后被派帶軍隊，与黃立貴同志一起，黃当团长，我当政治委員，独立团以紅十軍的一个特务营一个机槍連为骨干，那时黃道，黃富武同志均回閩北，連續打了几个胜仗，把局面打开了。卢兴邦、刘和鼎受了几个打击，特别是31年下半年崇安一役，解放了崇安城，消灭敌人一个营，在崇安城將近住了一年，到第二年快割稻子时离开，退到洋庄、大安、紫溪、星村这一帶，所以这一帶地区始終是老根据地，未受到敌人威胁。

32年下半年，紅十軍在方志敏同志亲自领导下，帶了六个团

打浦城打建阳，把浦城打开，苏区有很大的扩大，当时还有一个任务是筹款，因这时苏区经济有很大困难，浦城打开后即回信江。

32年下半年，也是中央苏区突破敌人三次围剿，开始四次围剿，彭总司令带三军团攻打建宁、太宁、黎川，首先打将乐，先消灭卢兴邦部队，后消灭刘和鼎部队，那时闽北独立团改为闽北独立师，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在建宁、太宁、光泽、邵武、将乐、建阳一带活动，这时是32年底33年初，闽北即成为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中央党的人员要通过此线去上海，当此时，正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队伍不能通过苏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转道江西、浙江到福建，所以蒋介石布置先消灭十九路军后消灭红军，32年33年是闽北苏区的极盛时代。

33年秋天，黄道同志调闽赣省，那时闽北党未犯错误前调的，黄道同志调走后，代理书记是肖韶同志，这时，我患伤寒病，鄒琦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军委工作，这时闽北提出“白区耕者有其田”“巩固地向前发展”（这原是赣东北口号，即先巩固后发展）口号，这时正是中央反罗明路线，张鼎丞同志、方方同志、万永诚同志（开始在赣东北，以后调福建省委书记，红军北上抗日时牺牲了）在闽西，现在看，如果罗明路线没有错误，那时闽北也没有错误，当时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说是平分土地，为什么提出耕者有其田，以后肖韶鄒琦调到闽赣省，这二个人都是黄埔生，是肃反对象，他二人找的老婆都是地主女儿，（肖韶老婆是打崇安俘虏来这一个地主女儿，鄒琦老婆是白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也是地主女的，）再加上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几个问题凑起来当做肃反对象，这个问题，我以后不清楚了。杨良生一向是做保卫局局长，如果肃反有错误的話，我了解政策上没错误，主要是作法上有错误，有逼供信现象，杨是来自审问的，推到邓发同志身上，当时整个苏区肃

反都沒有經驗，閩北肅反是有一點錯誤的，肅反不象今天這樣細致的調查研究。當時軍隊中也抓了不少，俘虜、幹部都有錯杀的。

地方黨當時是比較好的，環境是很艱苦的，但不知道搞經濟建設，主要靠收一點公糧和籌款來維持，幹部生活是艱苦的，但政策上是正確的，分土地，打土豪，所以蘇區還是堅持下來的，軍隊也是擴大的，以後編為獨立師，成為紅七軍團二十師，贛東北紅十軍二個師編為第十九師，第七軍團司令員開始是肖勁光，後是尋淮洲，再後是王如癡當軍長，這時蘇區鞏固了，軍隊擴大了，肅反雖然搞得那樣，蘇區也是鞏固了，這主要靠人民羣眾的覺悟，部隊靠情報工作，但經驗不夠。我們距敵人只五六十里路，一個襲擊即可搞垮，主要靠羣眾放哨眺高，幹部是背一個干糧袋，短槍都沒有，所以羣眾是擁護我們的，是掩護軍隊的，當時蘇區羣眾工作是有基礎的，否則憑什麼能向羣眾要公糧。

黨是鞏固的，軍隊是鞏固的發展的，由几百條槍發展到二千多條槍。以後成為主力紅軍之一。

關於俘虜政策，最初是很注意的，可以從軍隊中幹部的培養看出，當時自己沒有什麼軍事幹部，一種是拖槍過來一種是俘虜過來的經過短期訓練即成為幹部，只是在某些方面有犯錯誤有杀俘虜，但不是政策上的錯誤，即轉移時對俘虜有些不走的，逃跑的，或有叛變象徵的，楊良生說成營成連的杀，我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有一天，在一個會議上，我與汪金祥同志說起這個問題，他也認為不是那樣一回事，楊本人，我個人的看法，他與祝維恆都是閩北本地土幹部，楊當時兼保衛局局長，這人有點好大喜功，當時我沒有經驗，鍛煉不夠，有許多問題看不出，有時不敢提什麼意見，軍隊休整時，到特委所在地住一個時期，一般跟部隊行動的時間多。

肅反最厲害是32年冬天，現在我回憶起來確實有許多無辜，

如政治部有些青年婦女青年小伙子，說与外界反革命有勾結。当时沒有細致工作，把十几、二十来岁的人都当作肃反对象，这說明当时工作不夠細致，不是对人民对党負責，反正有人攻他就杀，肃反工作，羣众对我们是有怨言的，崇安邵春风，脫党多年，最近恢复党籍，以前是我的爱人，那时是在特委搞妇女工作，因肃反被捕关了一个很长时期，以后释放出，紅軍北上，她嫁给一个木匠，前年打听我在北京，我給她写了一个証明，現住在星村鎮鎮委会，还有几个老妇女同志也是受过苦难的，紅軍北上时躲山，还有楊賢嬌也是做妇女工作的，写信要我証明，她們是可以了解一些情况的。

那时部队缺乏子彈，一元光洋买二粒彈，一般是用土法做，用錫头火藥做手榴彈，鉄的手榴彈也做不来，那时用蒲包子做飯吃，羣众对我们太好了。

我感觉到有几个問題：

当时不会做經濟工作，也忽視这个工作，本来在山上是可以做許多經濟工作的。只有机械厂、被服厂、造紙厂、制革厂，主要是重視这个工作，因只市面上是靠白区的小商小販挑一些东西来，而且这些小商小販大多是敌人特务，一个是搞情报，一个是搞現洋，我們内部是使用紙币，对白区是用現洋，我們抓到許多小商小販是敌人偵探特务，但我們不知做經濟工作，經濟工作始終被动，敌人利用經濟攻我們，那时我們繳一挺机槍，償50——100元，繳一枝長槍償五元錢（以后太多了，只償二元，但必須現洋），敌人更毒辣，你償五元，他償十元，你償十元，他償二十元，如果我們經濟巩固，不会受那个影响，国民党貼示抓到共产党头子償多少錢。

我們自家搞貿易工作也是很弱的，我們派人到福州买布，到南平建阳浦城买藥，都是用金子，或且抓一个地主主要是要他多少錢。因此經濟工作与其他根据地比起来是最弱的。

政权工作还有一套，知道如何組織羣众，如組織赤卫队都有一些經驗。

干部的教育一般講还是重視的。自家有党校，有軍事干部学校，还有各种工作的訓練班，政治教育也抓得紧，刚到閩北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件，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在苏区是很普遍的，那时沒有电台，靠边沿地区国民党报纸，32年初才搞到了一部电台。

党内的干部还是团結的，当时有三部份干部，一部份是中央苏区和上海派来的，一部份是贛东北来的，一部份是閩北的，但沒有隔閡，本地干部有时流露不重視本地干部，因能力弱，不重視他們，但一般还看不出这問題。

我离开閩北后，吴先喜当政治委員，以后也犧牲了，这个干部也不錯。

汀浦城时，牺牲我們一个团參謀长，叫李金泉，李静愚是四川人，黄埔生，是軍区參謀长，以后粵贛边牺牲，（与何长工同志一起，长征第二年牺牲），李克敌回到紅十軍当副參謀长，是福建人，在虹桥也牺牲了，回到贛东北后的情况不知道。

有沒有改組派AB团活动呢？当时在贛东北閩北都有发现改組派AB团，最初发现改組派在贛东北破案，是上海来的材料，上海党发现有派改組派，AB团来贛东北活动，是否当时曾洪易就参加这个反革命組織很难講，他是上海派来的，找邵式平、方志純同志問一問，曾洪易一到贛东北就很左，他批評方志敏这样右那样右，以后他就代理省委書記，涂振农是比他后来的，那时他还好，是在抗日战争过后，他从延安到广州工作被捕叛变的，我现在有怀疑，曾洪易一来是就有問題，他要求軍隊天天打仗，一天几个命令，要你开这里打那里，那时在軍隊中就发现有AB团标語，有改組派活动，当时是破获过AB团組織，繳到AB团小册，破获一个卖布的，是从南昌到

苏区卖布来的，在閩北也发现有AB团活动和AB团标語，他們的反动标語也同样写在墙上，游击区經常是发现公开署名AB团改組派的标語。

当是閩北最大的威脅是大刀会、花籃会、民团，是本地反动地方武装，其次打大仗的才是国民党部队卢兴邦。

因为那时改組派（当时李济深等即系改組派）是合法的，傅柏翠是最反动的民团头子，搞我們最凶。

所以，有AB团改組派活动，有反革命，搞左了不是政策上的錯誤，是作法上的問題。

吴先民是从上海回来肃反了的，因他在30年下半年立三路綫过后到上海会报工作，那时上海中央本身发现罗章龙右派分裂党的活动，那时是否吴先民在上海犯了錯誤，回来即抓起来，我不大清楚，是否跟曾洪易有关系，这时因党中央发生这样混乱，他回来不久即被捕，是否中央有材料来，我不知道，还有因省委书记汪明同志（30年他到上海接我們的）也在上海回来，与吴先民一起被捕的。

当时对富农路綫有爭論，当时傳達吴先民等回来出了乱子，吴当时是紅十軍政治部主任，那时我在紅十軍搞团的工作。

陈耿同志是閩北领导人之一，是否因为肃反問題也不清楚，上海回来不久就被捕。

李得胜是閩贛軍区派来代替我的工作的，这个人作风不正派，他一来就向前委告我的状，說军队按兵不打仗。

土地改革，在贛东北是搞得好的搞得彻底的，是提出平分土地，与中央以后的土改精神没什么出入，閩北是根据贛东北搞的，一般没有什么大錯，但因当时群众觉悟不高，也有坏人钻孔子，羣众路綫是不夠的，队伍一到，就插牌子就分田，真正的貧雇农不敢接近我

們，只是二流子和积极分子接近我們，所以三天五天就插牌子，不象中央苏区搞得那样大的，因工作不深入，也有少数地方，因我們离开搞垮了的，但羣众总的是知道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与敌人搞得最凶的是广丰上饒玉山一帶，我們与敌人是一来一去的，那时羣众斗争也很坚决，有些羣众天天背起包袱，部队走他也走，拿起梭标种田的，我們有一次打华埠回来，伤员很多，都是羣众一站一站护送回来的。

如果土改不是那样好，羣众不会那样忠心拥护苏维埃，日夜挑高放哨保护我們，再說沒有餉，吃不好，很艰苦，但紅軍是一天天扩大，紅軍吃飯靠公粮，吃菜靠打地主筹款。

那是富农只沒收参加封建剝削的那一部份，地主兼商人是沒收其封建那部分，执行政策是很正确，还有一点錯誤，认为商人抽厘里的錢是浮財，一般現款是搞掉的，中农不动。

我感到方志敏同志的作风很多象主席，很細致，很会走羣众路綫。

苏维埃代表大会，我在只开过二次，我到閩北不久，即开过一次，在大安开过一次，崇安城也开过一次，前后差不多住一年。我是33年十月到閩贛軍区，正是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圍剿，我在七軍团十九师工作，那时粟裕是二十师师长，周建屏是十九师师长，粟裕不久提到第七軍团参謀长，罗炳辉是九軍团軍团长，始終未到过閩贛省。

黄立贵是27年下半年就开始搞游击队，黄立贵跟方志敏是贛东北九个起义者之一（記录者注：薛部长說到这里喉梗起来流泪說不出話来）他跟我一道工作已負过三次伤，到独立团工作又負过二次伤，他始終是英勇的，所以，一个斗争的胜利，党的政策是主要的，但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决定作用，許多战斗，

黃立青同志比我們有經驗的多，階級立場是很堅定的，他死了很可惜，他是國共合作時失掉警惕性而犧牲的，他沒有學過軍事，軍隊帶的很好，黃道同志也是很好的，很機智的，對幹部很關心，善于培養幹部，他也是失掉警惕性而犧牲的，他那時應該到武漢去醫病，不應該到河口去醫病。

肅反有些錯殺的，羣眾是有意見的，那時殺了就推到山坑里去，羣眾又偷偷把死首拉走埋掉，另外閩北有許多好幹部都到二十師去了，贛東北在皖南事變後也留得不多。

黃道同志對中央、贛東北派來的人是絕對信任的，不分那里的幹部，一視同仁，所以在艱苦環境里開小差的很少。

你們到老區了解一下。可以收到許多歷史的文獻文物。

我在閩贛省只一年多，顧作霖是中央委員，這個人是左一點，黃道是宣傳部長，彭皋是組織部長，以後閩北特委發生改組，黃道同志又重新回到閩北工作，黃道同志回來後是余澤洪同志（上海來）代替他的工作，他對地方工作是不很熟悉，彭皋是後來叛變了的，閩贛省是成立得很遲，是在33年下半，是三個結合部（江西福建贛東北），以建太寧為中心，它在戰爭環境當中成立的，以後巩固不好，土地改革搞得不好，加之領導有那么一個情況，本身沒有軍隊，最初把閩西三十師給它做基本隊伍，另外有二個獨立團，那時我在軍區工作，葉劍英元帥是閩贛省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原是軍委參謀長，他與劉伯承元帥經常調換工作，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在前委直接領導之下，以後滕代遠同志兼了一個時期的政治委員，以後邵式平同志是軍事委員會主席兼蘇維埃主席，當時蘇維埃委員，省委委員，布告中有公布過，記不清了，楊良生是否是委員，我已不記得。

在閩贛軍區不久，即34年春天（一、二月），我就到福建軍區

去，叶剑英元帅調福建軍区司令員，周建屏也調到福建軍区，我在福建軍区将近一年，又調到江西去。

閩贛省成立不到一年，工作底子也弱，首先是軍隊受損失，五次圍剿敵人首先向閩贛省圍剿，从臨川打进去，以后撫東地委情况，我不知道。

打崇安城，不是四月，我記得打崇安城是个襲击，繳了二百多支槍，我是穿單衣到閩北的，所以不是四月，問問黃知真的媽媽是否記得，

第一次党代会还有个做委員的是做工会工作的。

閩北独立師剛成立，政治委員是吳先喜，以后才是黃怀仁。

四次圍剿不是32年，是33年。

你們可把閩北党史搞出个材料，抄一份給中央办公厅主任楊尚昆同志，請他轉給中央有关首长同志审查一下，因中央有些同志，很忙，不好找，可由省委轉給楊尚昆同志。

附信一件：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

来信奉讀，未能及时作复，很抱歉！

囑咐我为閩北党史写材料事，因部里工作較忙，以致一直擱置到现在才執筆。由于我在閩北苏区工作時間很短，而且又限于自己当时的政治、政策水平，對你們的工作很难有所帮助。

我是1931年夏天同黃道同志一块奉調去閩北苏区的，黃道同志作党的工作，我則到紅十軍独立团工作（当时黃立貴同志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員）在軍隊中的時間較多。1932年八月負伤后，留閩北軍分区指揮部（后改为閩北司令部）工作，并参加中共閩北特委工作。1933年年底即奉調閩贛軍区。

凭我的记忆，我对当时中共閩北特委工作的估计和对一些方针、政策的看法，仅简述如下，聊供编纂工作的参考。

一、中共閩北特委在中共贛东北省委——（后改为閩浙贛省委）领导下，閩北党的工作和苏维埃运动，红军建设工作的成绩都是很大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在苏维埃政权工作方面；以崇安为中心周围二三百里地区的农民得到了解放，消灭了地主武装，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分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到1933年有六个县的苏维埃和几个区苏维埃——崇安、铅山、广丰、上饶、浦城、建阳等县和光泽、邵武等区。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贛东北省苏维埃所颁布的一切政策法规，保卫了苏区。在红军建设方面；由小的红军游击队而独立营、独立团，到1932年下半年成立了閩北独立师，此外，各县还有独立营、团、队，拥有各种枪支二千余支，有自己的红军干部学校，有兵工修械厂，地雷手雷制造厂。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历次的围剿，打垮了包围閩北苏区周围的民团、大刀会、花篮会等地主武装，胜利地保卫了苏区。完成了打通中央苏区的光荣任务，巩固了贛东北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要道，有力地调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这正是閩北党史光荣的一页。

二、在工作中曾经有过那些错误和缺点？根据我的记忆，可概括如下：

1、在巩固地扩大苏区工作中，有些过于保守，不敢大踏步前进，深入白区开展苏维埃运动，致閩北苏区发展较慢。

2、在执行土地法令上，1933年上半年曾经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当时閩贛省委认为这个口号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加上当时在中央苏区正在反罗明路线，所以对閩北特委指责很重。其实，当时情况与省委的了解是有出入的。事情的真相是这

样：閩北特委自接受打通中央苏区发展閩北苏区的任务之后，在中央紅軍影响之下，曾經不断地深入白区——特别是向光泽、邵武、将乐、建阳地区推进。这个口号是在閩北独立师深入白区后，为了争取发动农民运动，瓦解民团、大刀会，作为标语口号提出的，而不是在苏区内部提出的。因为这一个口号的原因，加上发展苏区工作上的右倾保守，閩北特委曾遭受到改組特委的处分，因而一些特委负责同志先后調离閩北，肖韶、鄒琦两同志的事，也在那时发生的，肖、鄒两同志是忠实英勇的好同志。今天应有正确的結論。

如果拿我們今天的政治、政策水平来看，特委在这个問題上并不算錯誤。至多是未請示报告，擅作主張的自由主义的行为。

3、在肃反政策上，应该肯定成績是主要的，但是，成績固然很大，錯誤也很严重。最突出的是在执行政策上的逼、供、信。以致牽連一些好人。錯杀了一些好人。我不同意楊良生同志所說的那样。我以为在这个問題上，楊良生同志要負相当的責任。他是政策的执行者。楊良生同志写的材料，把責任推到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同志身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肃反政策并未訂錯，肃反的对象也未搞錯——打击改組派，A、B团。当时在贛东北，在閩北确也发现改組派，A·B团的活动，并破获过他們的反动組織。只是在作法，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犯了錯誤，即是逼、供、信的錯誤。我认为今天也应该有正确的結論。

4、在对待俘虏問題上，的确，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內犯过一些錯誤，曾經有过杀害俘虏的現象。但这不是党的政策上有什么錯誤，而只是我們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犯了錯誤，我仔細回憶起来，也多半是处于敌人追击之中或者軍隊緊急轉移时发生的。而不是一般的都杀害俘虏。正相反，在閩北独立团、队中，很多連、排、班长乃至个别营长都是俘虏过来的，经过短时间的訓練即大胆任用，

信任他們，這可以查問一些老同志，即可知底細。

至于楊良生同志所写的材料中所說曾經有国民党軍隊投降的一个營都完全被杀掉的事，这事，我再三追思，也想不起曾經有过这么一回事，是否良生同志記憶錯誤？所傳閩北工作的老同志還不少，可以搜集一下，把当时情况查对清楚。

5、在財經政策方面，我以為在這方面我們是很大的弱點。当时在閩北苏区，除收公粮和少量的稅收外，在經濟建設上我們是很差的。（除了茶葉、竹筴、紙張可以經營外）因而財政另一來源即是到白区去打土豪，籌款，財政时常緊張，以致部队伙食錢都发不下去，这项工作应引为教訓。

以上所談，大部是1931年——1933年底我所親自見聞的事，我于1933年年底即調往閩贛軍区，不久又調去福建軍区去了，故对楊良生同志所述及的1934年以后的情况更不知道。

閩北党的建設初期情况，因知道不詳，不能提供意見。 致敬礼！

薛子正 58.12.5

退回楊良生所写的材料，有几个人名搞錯了，也根据我所知道的改正了。

又 及

（注：薛同志是先給我們來信，后我們去訪問他的）